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墨子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管子 孙子 兵法 孙膑兵法 吴子 尉缭子 鬼谷子 晏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商君书 慎子

尹文子 公孙龙子 人物志 淮南子 论衡

盐铁论 潜夫论 风俗通义 荀子 山海经

搜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抱朴子 内

篇 传习录 近思录 梦溪笔谈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墨子

春秋·墨翟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导 读 (1)

卷 一

- 亲士第一 (5)
修身第二 (7)
所染第三 (9)
法仪第四 (11)
七患第五 (14)
辞过第六 (17)
三辩第七 (21)

卷 二

- 尚贤上第八 (23)
尚贤中第九 (25)
尚贤下第十 (33)

卷 三

- 尚同上第十一 (38)
尚同中第十二 (40)
尚同下第十三 (47)

卷 四

- 兼爱上第十四 (54)
兼爱中第十五 (56)
兼爱下第十六 (60)

卷 五

- 非攻上第十七 (70)

非攻中第十八	(71)
非攻下第十九	(75)

卷 六

节用上第二十	(82)
节用中第二十一	(84)
节用下第二十二	(86)
节葬上第二十三	(86)
节葬中第二十四	(86)
节葬下第二十五	(87)

卷 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96)
天志中第二十七	(100)
天志下第二十八	(107)

卷 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115)
明鬼中第三十	(115)
明鬼下第三十一	(115)
非乐上第三十二	(126)
非乐中第三十三	(130)
非乐下第三十四	(131)

卷 九

非命上第三十五	(132)
非命中第三十六	(136)
非命下第三十七	(140)
非儒上第三十八	(144)
非儒下第三十九	(145)

卷 十

经上第四十	(153)
经下第四十	(157)

经说上第四十二.....	(163)
经说下第四十三.....	(172)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187)
小取第四十五.....	(194)
耕柱第四十六.....	(197)

卷十二

贵义第四十七.....	(205)
公孟第四十八.....	(210)

卷十三

鲁问第四十九.....	(220)
公输第五十.....	(230)
□□第五十一.....	(232)

卷十四

备成门第五十二.....	(233)
备高临第五十三.....	(233)
□□第五十四.....	(235)
□□第五十五.....	(235)
备梯第五十六.....	(235)
□□第五十七.....	(238)
备水第五十八.....	(238)
□□第五十九.....	(239)
□□第六十.....	(239)
备突第六十一.....	(239)
备穴第六十二.....	(239)
备蛾傅第六十三.....	(245)

卷十五

□□第六十四.....	(249)
□□第六十五.....	(249)

□□第六十六.....	(249)
□□第六十七.....	(249)
迎敌祠第六十八.....	(250)
旗帜第六十九.....	(252)
号令第七十.....	(255)
杂守第七十一.....	(270)

导 读

《墨子》是一本反映战国时期墨家学说的思想杂著，旧题墨翟撰。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早年曾习儒术，因不满其“礼”繁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身体力行，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楚、卫、魏等国，向王公大人宣传其政治主张，制止了多次战争。其中以与公输般论战，止楚攻宋最为著名。其学派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当时为“显学”之一。

《墨子》原书71篇，今存53篇，为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全书思想丰富，反映了墨家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宗教、逻辑等方面的观点、主张。

墨家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以解救时弊为直接目的的。《鲁问篇》载：“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兼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这里提出了十大主张，内容上包括宗教、经济、伦理和政治思想，而根本上说来，又都可视为政治主张。其意图就是要用这些具体主张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大害”，以消除下层百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的社会现实。

《墨子》认为，当今天下之大害，主要是有“交相恶”的现象存在，“交相恶”又源于对亲疏远近的分别，故应当用“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去改造社会。《兼爱中》提出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要人们取消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分别，使彼此利益兼而为一。《墨子》认为只要真正实现了“兼以易别”，那么就能使天下之人都相爱，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以贵傲贱、以智诈愚的现象了。《墨子》的“非攻”主张实际上也是“兼爱”主张的具体行动纲领的重要方面。

《墨子》还倡导“尚贤”、“尚同”之说。以为统治者任人惟亲是造成天下不得治的根源之一，因而应代之以任人惟贤的原则。《尚贤上》中说：“官无常

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又认为“交相非”促使了社会的混乱，故推崇“尚同”。“尚同”主张是要人绝对服从上面的意见，以长上者所说的是非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先逐步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到符合“天子”思想的地步，然后“天子”又使自己上同于“天”，这样，“天”的意志就是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

在哲学思想观上，《墨子》继承西周时代的天神观念，宣传“天志”、“明鬼”主张。墨子认为，“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天”通过对“天子”的赏善罚恶而管理世界。“鬼”有三类，鬼神比圣人还要聪明百倍，辅助“天”管理天下，其方法是对人的行为直接进行赏善罚恶。因此，“天”、“鬼”的地位高于人，人应把“天”、“鬼”意志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求“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墨子》认为，当时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大”、“鬼”这种权威失去了信仰，而一味胡作非为，由此，指责儒家不重天、鬼的思想，把它作为儒家学说导致丧失天下的四大罪状之一。

《墨子》一书中反映了墨家较为系统又极有特色的伦理思想。墨家道德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义”，“义”的观念来源于“天”，因而一切道德原则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对“义”的规定，归结起来，就是要人不要损人利己，而要人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墨子》提倡的那些具体主张都可视为“义”之一端，其中最根本的原则是“兼爱”，而这种“兼爱”是与儒家亲亲原则相对立的，它强调爱没有等差，要人在主观上取消人间的分别和界限，同等地爱他人。《墨子》认为尽孝道也要坚持这种原则，不仅要爱自己的父母，也必须同样爱他人的父母。“兼爱”道德的立足根据除了它是“天志”的体现外，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是对等互报的。《兼爱中》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从而利之。”以此而又形成了义利统一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墨子》书中也体现出充分的逻辑思想。《墨子》的全部政治伦理学说都有较严格的逻辑论证。该书最初从逻辑学角度提出“辩”、“名”、“类”、“故”等逻辑范畴，还提出“辩故”、“明故”、“无故从有故”等论辩中的逻辑要求。《墨子》的“三表法”不仅提出了推理论证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在逻辑上进一步明确了“知类”、“明故”的具体范围，其中也包括有由一般到个别（演绎法）和由个别到一般（归纳法）等推理方法。《墨子》中《墨经》6篇所反映的墨家逻辑思想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较完整的逻辑学体系。

自从秦汉统一以后，墨家逐渐成为“绝学”。但《墨子》一书中的思想内容，则为后世各家所吸收、改造融会形成新的学派。如书中的“尚贤”、“尚

同”政治理想就为商鞅、韩非所吸收，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法家”。书中的“天志”、“明鬼”的宗教观也为汉儒董仲舒的更加精致的“天人感应”说所代替。书中带有原始平均色彩的“兼爱”学说，也被战国后期的儒家所吸取改造，成为《礼记·礼运》篇大同思想的滥觞。所以，《墨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

卷一

亲士第一

入国而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則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

治理国家而不厚待他的贤士，就要亡国了。看见贤士而不急于亲近任用，便是怠慢他君主的国事。人君没有比厚待贤士更为紧迫的事了，没有贤士，就没有人为国家出谋划策。怠慢贤士，忘掉亲近并任用贤士，而能够使他的国家长存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从前，晋文公离开晋国避难，后来又作了诸侯盟主；齐桓公离开齐国，最后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蒙受吴王的凌辱，但能卧薪尝胆，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个君主所以能够成名而称霸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忍受大耻以求雪仇于来日。所以说，最好是不遭失败，其次是虽遭失败而能从中吸取教训，设法转败为胜，这就叫做善于任用贤士。

我听到过这样的话：“不是没有安适的居处，是我没有安定的心志；不是没有富足的财产，是我怀着无法满足的心志。”所以道德高尚的君子自己承担难事，使他人承担易事；道德低下的普通人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让给他人。君子对于士人的进步则加以鼓励，不挫败他的志向，对于士人的退步则审察实情；不随意苛责，即使在士大夫中夹杂着几

其所恶者也。

是故偏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洛洛之下，分议者延延，而交苟者洛洛，焉可以长生保国。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唶，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

个平庸而不足取的人，也始终不产生怨恨的心，因为君主相信自己亲士政策的正确。所以做那些困难的事（指亲士），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没有听说专做那些容易的事（指轻贤慢士），而能避免坏结局的。

所以辅弼之臣能大胆矫正君主的过失，谀谄之臣只会伤害君主。君主一定要有敢于提反对意见的臣子，上级一定要有敢直言争辩的下级，分辨争论的人断断相持，互相责难的人谔谔不让、据理力争，决不会产生奉承阿谀之风，这样才能保全国家，并且长存不衰。

臣子如果只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去劝谏，国君左右近臣默不作声，离国君远的臣子也闭口不言，怨恨就会深结于百姓心中。谄谀之臣在国君身边，好的建议、主张被阻塞，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不就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贤士吗？因而身遭杀戮，丧失了天下。所以说：馈赠国宝，不如举荐贤士。

现在有五把锥子，这是最锋利的一把。最锋利的一把肯定最先被折断。有五块山石，这是最好的一块磨刀石。最好的磨刀石肯定最先被销磨。所以，甜美的井水，一定最先枯竭；高大的树木，一定最早被砍伐；灵验的乌龟，一定最先被火烧灼（以求卜卦）；神异的蛇，一定最先被捉来曝晒（以求降雨）。所以比干遭纣剖心而死，在于他刚直不屈；孟贲被秦武王所杀，在于他显示了自己的暴力；西施被越人沉于江中而死，在于她长得美丽；吴起被楚国贵族车裂而死，在于他改革政治而取得了功效。所以那些人很少不是死于自己的长处、优点。因此说：过于突出就难以保全自身了。

所以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不喜爱无功

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境墝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的臣子；即使是慈爱的父亲，也不爱他无用的儿子。凡是不能胜任这个任务，而处在这个位置上，一定不是这个位置上的人物；不胜任他的爵位，而据有他的俸禄，一定不是这项俸禄的应得者。良弓不容易拉开，却可以把箭射到高处，射入深处；骏马难以驾驭，却可以负载重物、驰至远地；贤才不容易唯命是听，却能够使君主处于受尊重的地位。所以江河不嫌弃泉水的源源灌注，方能增大水量。圣人勇于任事而不怠慢于士人，才能成为天下的英明君主。所以江河里的水决不是源出于一处；珍贵的皮裘决不是一块白狐皮缝就。哪有与自己相同的就采取，与自己意见不相同就不采取的道理呢！这不是兼爱天下的原则啊！

所以大地显示出明亮，而美丑全部摄取；大水不显示出潦潦之势，而川泽全部收涵；大火燎燎为盛，而草木全部容纳；兼王之德不尧尧为商，而贵贱都加以亲近。管理千人之众的官吏，直得像一枝箭，平得像块磨石，刻板拘泥根本不能容纳万物。所以溪流狭窄的干枯得快，土地坚硬的长不出五谷。一个君王的淳厚恩泽，只局限在宫中，就不能传播到全国了。

修身第二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

君子打仗虽然讲究战斗队列，但以勇敢为根本；丧事虽然讲究礼节，但以悲痛为根本；做官虽然讲究学问才识，但以品行为根本。所以置立的根基不稳固，不可能追求繁茂的枝节；对左右亲近的人不加亲爱，不可

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羸颠，而犹弗舍者，其惟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辨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未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情。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

能努力招徕远方的贤人；内外姻亲不肯归附的，不可能追求非亲非姻的人；做事情有始无终的，不可能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尚且弄不明白的，不可能去追求广见博闻。

所以先王管理天下，一定先明察左右，然后招徕远方贤士。君子明察左右因而左右亲近之人也就跟着修行起来了；君子如不讲究修行而受到人们的抨击，那就应当反躬自问，这样，便会使人们的怨谤减少，而自己的品德也修行好了。恶意诽谤的话，听而不闻；抨击中伤的言论，不出于己口；杀伤人的酷毒，不存于心；即使有喜揭他人隐私的小人，也没有什么可以依存了。

所以君子勤劳从事就日益强劲，志愿就日益远大，庄敬的品行就日益完美强盛。做一个君子的原则是：贫穷就显示出廉洁，富裕就显示出仗义助人；于人之生能表现出自己的爱慕，于人之死能表现出自己的悲哀。这廉、义、爱、哀四种品行是来不得弄虚作假的，而是需要反躬自问的。存在于内心的，是尽力爱人；身体力行的，是尽力恭敬；出口言谈表达的，尽量合乎情理。让爱人之心伸展到手足，通达于外表动作，直到头发花白，乃至秃顶，尚且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地注意自身修养，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人，智力不能发展；说话不讲信用的人，行动不会果敢。拥有财物不能分给别人的人，不足以交朋友；信仰不专一，分析事物不全面，囿于一见而不能博观，分辨是非不明察的人，不足以共同游学。根基不稳固的人，结局一定危险；事先不修行的人，到头来一定要垮台。源出于浊水的，其流水不可能清澈；行为不讲信用的人，其名声一定会受到损害。名声不能无故产生，

名誉不能自己长成。

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

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功成名就，名誉不能虚假，需要反躬自问的。光说而行动迟缓，即使口才好也没有人听；出力多而要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劳苦功高也不可取。富有智慧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夸夸其谈，努力做事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这样就能使名誉传扬于天下了。说话不讲究繁多而在于追求智慧，不讲究文采而在于追求精确。所以说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懒于做事、怠于修行的人，就要跟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了。

善不能出自内心的人，不能保持善，德行不能在内心反复审辩的人，德行也树立不起来。名声不能够轻而易举成立，名誉也不能靠欺骗取得，君子应当身体力行，言行一致。一心考虑个人利益并竭力追求，毫不顾算自己的名声，而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下贤士的，那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

墨子先生看到染丝的就感慨地说：“洁白的丝染在青色染水里就成青色，染在黄色染水里就成黄色，浸入的染料变了，丝的颜色也就变了，丝五次入于不同的染水，就成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丝不可不谨慎啊！”

不只染丝是如此，国君同样也要受近臣的熏染影响。如虞舜受许由、伯阳的熏染影响，夏禹受皋陶、伯益的熏染影响，商汤受伊尹、仲虺的熏染影响，周武王受姜太公、周公旦的熏染影响。这四个称王的君主因熏染影响他的人正确得当，所以称王于天下，

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要举出天下仁义著名的人，一定要说到这四个称王的人。

夏桀王受干辛、推哆的熏染影响，殷纣王受崇侯、恶来的熏染影响，周厉王受厉公长父、荣夷终的熏染影响，周幽王受傅公夷、蔡公谷的熏染影响。这四个称王的人因熏染影响他的人不正确不得当，所以国亡身死，被天下人羞辱。要举出天下不义的可耻的人，一定要说到这四个称王的人。

齐桓公受管仲、鲍叔牙的熏染，晋文公受舅犯、郭偃的熏染影响，楚庄王受孙叔敖、沈令尹的熏染影响，吴王阖闾受伍员、文义的熏染影响，越王勾践受范蠡、大夫文种的熏染影响。这五个君主由于熏染影响他的人正确得当，所以称霸于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受长柳朔、王胜的熏染影响，中行寅受藉秦、高强的熏染影响，吴王夫差受王孙雒、太宰嚭的熏染影响，知伯摇受智国、张武的熏染影响，中山国君尚受魏义、偃长的熏染影响，宋康王受唐鞅、佃不礼的熏染影响。这六个君主由于熏染影响他的人不正确不得当，所以国家灭亡，身遭杀戮，宗庙毁灭，断绝子孙，君臣离散，百姓流亡。要举出天下贪暴苛刻烦扰的人，一定要说到这六个君主。

凡国君能安安稳稳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他们行正道。行正道产生于熏染影响他们的人正确得当。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在选择人才方面尽心竭力，在管理官吏方面就清闲省事了。不会做君主的人，尽管伤身费神，忧心劳意，但国家却更加危险，自身更加受辱。这六个君主，并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不爱惜他们自己，而是由于不懂得治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国要领的缘故。他们不懂得治国要领的原因，正是由于熏染影响他们的人不正确不得当。

不只是国君要受近臣的熏染影响，士也要受朋友的熏染影响。他的朋友如果都爱好仁义，淳朴谨慎，畏惧法纪，那么他的家就一天比一天富裕，自身就一天比一天安全，名声就一天比一天升高，居官从政就得到正道了，如段干木、禽滑厘、傅说这类人就是这样。他的朋友如果都爱好骄夸，兴风作浪，结伙营私，那么他的家就一天比一天贫穷，自身就一天比一天危险，名声就一天比一天不光彩，居官从政就失去正道了，如子西、易牙、竖刁这类人就是这样。《诗》所说的“必择所堪，必谨所堪”（染料必选正，浸染要谨慎），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法仪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迨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辨也。”

子墨子说：世界上办事的人，不可能没有法度。没有法度，而能办成功事情的，从来没有看到过。即使是身为将相的士人，都要依循法度；即使是各种手工业技艺工人和做具体工作的人，也都要依循法度。各种手工业工人用矩画制成方形器物，用圆规画制成圆形器物，用绳墨划直线，用水准器测定水面，用墨垂制成立直之物。无论是技巧高还是技巧低的工人，都要拿以上五个方面作为行事的法度。技巧高的能合乎标准，技巧低的虽不能合乎标准，却能仿照着做，还是能超过自己本来的水平而有所进步的。所以各种手工业工人办事，都要依循法度的。如今最高的职位是管理天下，其次是管理国家，